

甲骨文与中国历史叙述的建构

□代生

甲骨文与20世纪中国学术

五四运动后，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的思潮，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潮流之一。这种思潮始于清代辨伪之风，经胡适“东周以上无史”论的鼓吹而发展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王国维作为利用甲骨卜辞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人”，对疑古思潮进行了有力反击。当然，这并非正面的论战，而是不断寻求甲骨文等资料论证古史，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20世纪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王国维提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的说法，即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对古书、古史的怀疑而言的。甲骨文成为王国维等学者诠释文献、“接续”古史的重要材料。

近百年来，关于“疑古”的争论一直是史学界富有争议的话题。学者的研究虽然已经不再受制于疑古思想，但讨论的基点，往往是从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具体结论入手，做“古史重建”的工作，这正说明了疑古思潮影响的深远。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的就是古书的年代和可信度，尤其是《山海经》等典籍在近代学术中的命运问题。近代以来，学界对《山海经》《天问》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多将之视为“怪力乱神”而束之高阁。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以甲骨文与《天问》《山海经》等材料结合，印证了《史记》语焉不详的殷先公王季、王恒、王亥、上甲微。在论证中他激动地说：“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记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

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这一论证，可谓凿破混沌，在当时即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学者开始对《天问》《山海经》的史料价值重新认识。如傅斯年评价说，《天问》《山海经》所记的材料“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国维）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资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材料“登时变活了”。

虽然如此，当时的学者对《天问》《山海经》的价值仍有不同意见，认为它们所记与甲骨文能够客观或出偶然，不能说明其他部分亦有可信的史料价值。有感于此，胡厚宣先生又从甲骨文四方风的有关材料出发，证明《山海经》《尚书·尧典》相关内容的可信性，甲骨文再次成为印证《山海经》等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证据，进一步扭转了20世纪学术的走向。这里可以傅斯年的思想转变为例，傅氏早年疑古，而后转向重建古史，影响他的，除了殷墟的考古发现外，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微妙的影响”。

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全面建构

目前所见系统而全面的商代史料主要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但《殷本纪》全文只有2868字，所记内容大都聚焦在商汤与纣王身上，涉及其他殷商史事的多寡可想而知。司马迁所依凭的资料“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即《尚书·商书》和《诗经·商颂》，这些资料加起来也没有多少文字，文献不足成为制约商代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原因。甲骨文和殷墟考古资料的不断公布逐渐弥补了这些缺憾，保守统计，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早已超过15万片，内容涉及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近百年来，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

胡厚宣等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尤其以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利用甲骨文资料探讨商代历史文化最为全面，但相较于庞大的甲骨数量而言学术研究还是滞后的。世纪之交，宋镇豪主持了“商代史”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出版了11卷本700多万字的《商代史》，成为利用甲骨文等资料重建商代史的集大成作品，也是目前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的最全面的论著。

商王室采用五种祭奠方式轮流而又周而复始地祭祀成系列的先公、先王、先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周祭制度。《殷本纪》所载的30多位商先公先王中，至少有27位见于甲骨的“周祭”系统，通过比较可知只有部分内容属于司马迁误记，可见甲骨文全面印证了《殷本纪》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记载准确性。从商朝灭亡到司马迁时代已有近千年时间，殷人世系能够完备保存，得益于周代完备的史官系统，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汤以前的先公多处于夏代纪年之内，甲骨文资料与《山海经》《天问》《史记》记载的互证，可以佐证《夏本纪》有关世系的可信性，对此王国维已有预见：“《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建构，为研究夏代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文与商周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甲骨文主要指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周人的甲骨，如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周原发现的甲骨，有字的卜甲达300片；本世纪初发掘的周固庙遗址，出土甲骨1万余片，可辨识文字近2600个，其内容尚未完全公布。可以说，周人的甲骨资料数量也足够庞大，这对

研究周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周原甲骨可分为商亡前后两个部分，其文字字体也有区别，武王克商前主要是周文王时期卜甲，其字微小秀丽，工整有力，和殷商甲骨相比而言，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差距甚微。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周原甲骨，说明了商朝末年商人和周人应用着基本相同的文字，而商周两代的文字完全是一脉相承，其间不能划出明显的分界……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商周文化的连续性。”

周文王有关甲骨主要涉及商周关系，尤其是“H11：1”“H11：82”“H11：84”“H11：112”四片，记录的是周人作为殷商方国联盟中的一员，在没有足够实力与商王朝抗争时，只能在周地建立商人宗庙，通过杀伐活人作为祭品等方式来祭祀商人先祖，被迫与商纣盟誓，通过盟誓之言向商人作出永不叛商的保证。我们知道，“神不散非类，民不祀非族”，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并不受此类“原则”所限，不仅自己祭祀异族神灵，还要求周人祭祀自己的先祖，这是扩大神灵影响以迫使周人遵守商人的统治。这无疑是一种宗教垄断和控制，也说明当时商周民族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

周人刻写甲骨的传统从何而来？商周甲骨文字的一脉相承所体现的文化连续性对中华文化基因传承有何意义？殷墟甲骨中有多少反映夏代及以前时代的资料？这些是除了甲骨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等之外仍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甲骨文为中国历史的书写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文化、文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带来了新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将之提升到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高度，学界也正在掀起甲骨文研究热潮。对甲骨文等资料的深入研究，也一定能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纷争，为重建古史、传承中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从考古看文明

马上掉下来摔死，贾谊因此每日哭泣，最终不食而死，这也是陆贽所不能做的。因为陆贽与当时的宰相裴参关系不睦，其为难之情，胜过忧国忧民。王夫之认为，贾谊做学问，粗而不纯，差不多与陆贽相同。而贾谊任智任法、想制伏匈奴、削弱诸侯，他的三表五饵之术，乃是稚儿之巧；他削弱吴国和楚国而加强齐国，为了照顾自己的私人感情竟然不惜给将来留下莫大的忧患，这乃是仆妾之智，陆贽是不赞成这些做法的。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辅佐少主、固守孤城、仗节守义，以不失其忠贞，则陆贽不如贾谊；而出入于纷乱之中，调御轻重之势，斟酌急缓以出险而经远，则贾谊不如陆贽。因为贾谊年轻气盛，愤世嫉俗，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而性情坚贞的人路为恒疏，则本有余而未不足。由此可见，贾谊与陆贽各有所长，互有优劣。

作为不世出的政治理论家，贾谊没有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33岁就不幸殁命，无论怎么看，对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悲剧。贾谊有才，固然可喜可贺，但他看到一只猫头鹰落在自己的座椅上便以为自己大限已到，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而又特才傲物、顾盼自雄，这样不足以承担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贾谊怀才不遇主要是他自己的原因。西汉刘向说贾谊的能力不逊色于古代的名臣伊尹、管仲，但伊尹、管仲的周围也定是庸人居多，所以，有学者指出，能够和平庸的人合作，并且引领他们一起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旷世英才。

人物志

（上接1版头条）建立健全反映各类经济主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统计指标，健全“三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优化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情况的指标，丰富需求侧管理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指标体系。完善反映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等方面的统计指标。

推进统计调查制度现代化。健全“三新”统计监测，完善互联网经济统计制度，改进研究与试验发展统计调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现代产业统计，加强与粮食产量调查为核心的农业统计，完善工业统计，加强服务业全行业统计。完善需求侧管理有关统计，综合测算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着手开展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统计监测。加强能源资源环境统计，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社会民生统计，加强就业失业统计，完善住户调查，改进劳动工资统计，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统计。

推进统计方法手段现代化。强化经常性抽样调查主体地位，考虑整体设计并分别推进“四下”企业抽样调查、住户类调查、价格类调查、劳动力调查。坚持普查与常规统计调查一体化设计，充分发挥普查为常规统计调查提供抽样框作用，研究整合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积极推进部门行政记录和统计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大数据在各类统计调查中的应用。巩固拓展联网直报平台，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场景。建设国家统计云平台。

推进国民经济核算现代化。进一步加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研究健全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完善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编制，改进资金流量表编制。稳步推进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开展全国和省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编。完善“三新”经济和文化、旅游、体育、专利密集型等相关产业核算方法，扎实推进农业及相关产业、数字经济等相关产业增加值核算。

推进统计分析服务现代化。围绕服务宏观经济治理，加强经济监测分析研判，强化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分析，为强化预期管理、提高调控科学性提供更具前瞻性的依据。坚持“能发布尽发布”原则，不断丰富统计数据发布内容，更好满足公众多样化统计信息需求；深入开发微观统计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便利；加强统计数据解读，帮助社会公众正确理解使用统计数据。做强“中国统计开放日”品牌。

推进统计管理体制现代化。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压实地方和部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指导地方和部门加强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推动压实地方和部门统计工作力量，规范面向基层的统计调查项目。加强国家统计机构对地方统计机构业务领导机制，落实相关干部协管制度。深化国家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的，弘扬新时代国家调查队精神，强化快速调查职能。深化统计对外开放，加强双边多边统计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统计标准和规范制定，助力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建设。

推进统计法治监督现代化。认真组织实施常规划计督察、专项统计督察和统计督察“回头看”。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依纪依法查处重大统计违纪违法行，组织实施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强化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追究，加大案件通报曝光力度。加强统计领域信用建设。积极推进统计法修改，继续推动将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积极构建统计普法宣传教育平台和长效机制。

（上接1版二条）仅就经济而言。疫情袭来，同样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但是全年来看，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正增长的国家。短短几个月，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这种奇迹是怎么创造的？无论是西方的学者还是外国的政要，看中国恐怕不仅要用眼睛多看，还要用脑子多想，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中国一年来的成绩，即使再有偏见的人，心里不服气也不行。何况，中国一边抗疫，一边统筹发展，一边依然坚持为世界抗疫和经济发展多作贡献，依然拿出实实在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这种大道之行义的精神，已然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天下为公的全球观，已然站到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岂能是“以我为先”的小家子气所能比肩的。过去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常万机处理国事的同时，出席数十场国际会议，通过视频，中国声音、中国主张迅速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世界投来的目光，自然含有多成分，但是无疑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公正。世界瞩目，首先瞩目的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是什么样的国，中国之治是什么样的治。在瞩目中，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

载入史册，必须大书特书。过去的一年，360多个日夜，中国经历了什么？中国人经历了什么？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2020年，如何评价我们的作为？我们必须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倾尽笔力，浓墨重彩，给历史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载入史册必须首先写好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的故事，写好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开创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故事，写好中国人民创造辉煌、创造历史的故事。

载入史册可不仅仅是文学家、史学家写的，实际上更是共同走过的每一个中国人书写的。2020年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每个人都了不起。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把一个大疫之年、抗疫之年，生生地铸就成了一部史诗！

贾谊究竟是否怀才不遇

□丁万英

贾谊被许多人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把他和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合在一起，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其实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影响差别很大，所处环境和历史境遇也有很大不同。

贾谊究竟算不算怀才不遇，历史上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贾谊是怀才不遇，这种看法以司马迁为代表。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为一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贾谊出贬长沙就是屈原流放汨罗的悲剧翻版。但这并非事实：汉文帝对于贾谊的才华自始至终都充满欣赏，重用贾谊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打算。汉文帝是知人善任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四年之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把他征召入朝。当时汉文帝刚刚举行过祭神仪式，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坐到坐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是比不上他啊。”有感于汉文帝的这番举动，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认为汉文帝千里迢迢把贾谊召回，却不委以重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第二种看法以班固为代表，他认为，汉

文帝原本就是遵循清静无为的治政风格，在这种风格之下，贾谊提出的许多主张都已经付诸实践了。贾谊的悲剧源于死得太早，最后没有位居公卿，但是谈不上怀才不遇。

第三种看法以苏轼为代表，认为贾谊属于“才不自用”。苏轼专门写过一篇《贾谊论》，他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才有余而识不足”，并强调要“有所待”“有所忍”，才能担当大任。

苏轼承认贾谊是王佐之才，但他提出，君子要想达成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并不在于外部原因，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苏轼指出，贾谊最大的毛病是“不善处穷”，就是不善于在不得志时安身立命。他还为贾谊规划了详细的为政韬略：像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同僚，要从容地、渐进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指出，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抗压能力不足，满腹才华却郁郁而终。贾谊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大汉王朝的损失。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苏轼认为，古人 and 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王猛，在很短时间就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能占据半个中国，恐怕就是因为他能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同时苏轼也认为，如果君主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这类人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上述三种观点都是直接评价贾谊是否怀才不遇，而史学家王夫之却从比较中发现了历史人物际遇不同的原因。王夫之认为，贾谊、陆贽、苏轼这三位文臣有相似的地方。陆贽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司马光对其素养才能、品德风范推崇备至；苏轼则是公认的大才子。陆贽与苏轼，都自认为是贾谊一流的人才。别人称许他们时，也认为这两人与贾谊的遭遇相似。王夫之认为，实际上，陆贽很仰慕贾谊，而不能成为贾谊那样的人，但是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贾谊；苏轼也很仰慕陆贽，但更仰慕贾谊。

王夫之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贾谊主张豫教太子以端本，奖励廉正以改善风俗，这是陆贽所比不上的。换句话说，贾谊是“宏识远议”，“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救世”的一代之大儒”，是战略规划大师，而且忠贞不二。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不慎从

做扎实、做到位，为选人用人提供准确、客观、详实的依据。

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关键在于立公道，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做好干部工作，选好人用准人，固然在宏观环境和微观操作上需要许多条件，但最核心的是公道正派。用人真正做到了公道正派，其他的都变得简单了；如果公道正派上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再好的干部也可能选不出来。在选人用人上做到公道正派，就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不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简单地搞平衡照顾、论资排辈，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始终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就要坚持严格按制度按规矩行事，自觉

（上接1版三条）我们选人用人的标准，概括地说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具体地说就是党章所规定的领导干部六个方面基本条件，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等重要要求。坚持好、落实好这些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聚焦“干事”二字，把标准落细落小，落到操作层面，落到具体人具体事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敢不敢干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敢不敢干事”检验担当，“愿不愿做事”检验态度，“能不能干事”检验才干。这三点，是知人识人的重要观测点，也是选人用人的重要考察点。把这几个点考准考实了，才能避免用人失察、用人失误，才能做到用当其时、用其所长。